

目 录

办学育人杜元白·····	谭众孚 (1)
张超然捐资兴学·····	郑家龙 (7)
回忆彭季然先生致力办学 的几个片断·····	向怀思 (10)
壮志初酬谭子卿·····	谭众孚 (17)
解放前秭归中学的点点滴滴·····	崔德骏 (22)
屈乡风俗·····	舒德玉 (28)
解放前新滩一带的葬礼·····	游少麟 (44)
秭归县黄家乡的传统习俗·····	王 敏 (48)
录碑文记·····	舒德玉 (52)
公正廉明的陈扬庭·····	杜开许 (55)
杨干秋事·····	郝大忠 龙 飞 (67)
杨干县长办事迅速果断一例·····	王 晖 (75)
王宪之其人·····	游少麟 谭众孚 (77)
中草药医师王克汉·····	舒德玉 (81)
太坪庵喋血记·····	宋发武 (86)
民国时期秭归监狱杂记·····	郝大忠 (95)
三台一霸——秦梓高·····	谭本善 (98)

一架侵华日机坠落后的闹剧·····	杜国文 (103)
日本侵略者轰炸台子湾	
的部分罪行实录·····	周立祯 (110)
追捕陈定国·····	郝大忠 (113)
义愤填膺百名知识青年	
从军抗日·····	彭恢琛 (118)
民国时期桡工的悲惨生活·····	郝大忠 (122)
小新滩等地纪念屈原的庙宇和地名·····	郑沛年 (127)
峡江红船始末·····	杜国文 (130)
新滩八大客帮会·····	杜 慧 (133)
解放前居隐乡的“二五减租”、剪发等·····	王 晖 (135)
真耶稣教会茅坪祈祷所概况·····	杜开许 (138)
戊辰年沙镇溪一带	
神兵活动简况·····	许 民 (149)
周继财试制机帆船之始末·····	杜云涛 (152)
建乐宝善塔·····	傅承超 (155)
归州景绘尽生妍·····	王亚东 (157)
老建东乡地名诗·····	傅 斌 杜开许 (158)

办学育人杜元白

我国从推翻清王朝到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这二十年间，在通都大邑虽先后办起官学，但在穷乡僻壤的广大农村，官学可说凤毛麟角。特别是内地农村，要让孩子念书，就只得去上那沿袭几千年的私塾。

新滩这个滨江乡镇，由于有一道大滩，在河下求生的人特多。他们上四川下湖广，见闻较多。后来轮船逐渐代替了木船，他们中的许多人一变而成为收入颇丰的轮船领江（引水）。他们上川下鄂，沟通信息。这期间，加上大革命潮流的影响，新滩不少爱国青年汇入革命洪流。这样，新滩成为一个得风气之先的不封闭的乡镇。

人们视野的开阔，带来了求知欲望。而作为求知场所的私塾，已不能适应时代需要。因而人们渴望能有官学出现。

在这种情况下的新滩，有谁能起而率先办官学呢？有，那就是杜元白其人。

杜元白（1904——1949年），学名应铠。少孤贫，由幺叔抚养。早年曾在商店当过学徒。及长，在地方上的保卫团当过庶务（办事人员）。

杜元白深受时代潮流影响，又痛感家乡教育落后，遂起而率先于1931年农历八月十六日以杜家祠堂为校址，创办了一所新学制小学——新滩北岸小学。

开办之初，只能以康济堂（民间慈善机构）的少量租稞为经费来源。筚路蓝缕，惨淡经营。第一期招收七至九岁新生入学，自任级任老师。翌年，学生增加，他自任校长，聘请志同道合的杜德三为教员。尔后，私塾逐渐被淘汰，这所学校也逐渐增加班级。

1937年，抗战军兴。后来武汉、宜昌等地相继沦陷，学校以及逃难者西迁。于是，新滩学生骤增。教室不敷。这时适逢在万县聚兴诚银行当行长的王宪之回乡探亲。杜元白与之叙谈时，吐露了校舍不敷限制了学校发展的困难情况。王当即慨然捐赠银币200元。杜元白随即经手买了学校背后有天井的民房一大栋，改

建成有七八间教室的、校政厅、大礼堂和教务处齐备的“回”字形楼房学校。至此，新滩北岸小学从杜家祠堂迁入宽敞的新校舍。在此期间，杜元白广与各界接触，捐助者不乏其人。因而，除新添了课桌凳，其他如风琴、留声机、洋鼓、洋号、口琴笛子、以及毛算盘、各种挂图和体育设施，也一应俱全了。

1940年，湖北省立秭归第一小学迁到新滩。新滩北岸小学新校舍让给省一小。新滩小学仍存在并随即迁入原址杜家祠。于是两校并存。新小部分学生进了省一小。不一年，因竞争关系，加上其他原因，省小学生不多，因而迁去秭归水田坝。新滩北岸小学再迁入新校址。

省一小迁走，绝大多数学生不可能随去。新小学生倍增。班数到1942年增至十二个。为了方便远处学生就近上学，另在龙马溪和余家坪各设一分部，分别由游少麟、乔建老师负责。学生总数达500多人。教职员工有杜元白（校长）、张树业（教导主任）、邓之用（兼事务主任）、游少麟、乔建、聂云瞻、任若倩、

李传荣、杜楚祥、彭维壩、杜静萍、柳竞、龚实秋、张映斗、王云波、余天民、翟正淑、杜富荣（事务员）、以及工友等20人。

为了使镇上失学青年有学习机会，学校设民教部于杜家祠。由乔建老师兼管。老师轮流每晚辅导学习两小时。

这所新滩北岸小学，每到傍晚，琴声笛声萦绕校园，健儿们奔跑在篮球场上。华灯初上，又响起了琅琅的夜读声。成为这个镇的文化中心的新滩北岸小学，生机勃勃，欣欣向荣。

新滩北岸小学经费来源，当初是康济堂部分租稞加上社会筹集；中间曾是地方垦荒粮移作教育经费和来自渔坊部分收入；后来改由县按月拨发。

1941年，实行县乡自治，杜元白校长兼乡长。政务与校务集于一身，不能专心于教育，加上当时地方上的腌臢事和后来他被选为临时参议会参议员，所以杜元白曾一度违心地离开了学校。这期间他曾与人合伙开挖炭洞子——小煤窑。他手头宽松多了。

杜元白在离开学校工作后的1946年秋季，县长高云安理解他志在教育，于是委他为屈平乡中心国民学校专任校长。当时，抗战已胜利结束，外籍学生迁走，学生减少。但由于杜元白重掌校政后，特别重视教学质量。学生虽减，升学率却高。因而这所学校仍不失当年声誉。

杜元白治校，首先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同时也要求别人恪守岗位，勤恳负责。他早中饭与老师和寄宿生一道吃。伙食一有问题及时解决。实行每星期三开一次教职员工全体会议。大家自谈工作心得体会或成绩问题。他鼓励大家提出意见、建议和批评。每星期六教职员聚餐一次。这样，校务教务上的问题以及老师间有什么矛盾，解决于会上和席间，从而大家融洽无间，同心协力办好学校。

解放前，新滩北岸小学，享誉峡江并非偶然，是杜元白治校有方、身体力行的结果。

辛勤耕耘，必然带来丰收硕果。解放后，新滩人参加革命工作的不在少数。在新小读过书，后来在解放初和在50年代中期读上大专的

学生有十多人，中等学校的学生当然更多。这在全县来说，是比较突出的。

1949年秋，杜元白因病去世。终年45岁。遗一子一女。

谭 众 孚

1988年9月

张超然捐资兴学

从《秭归教育志》所引的《民国6年——35年个人捐资兴学一览表》中可以看到张超然两次捐资兴学的事迹：一为民国32年捐田、屋，价值法币480,000元，获省二等奖；一为民国35年捐田、屋等，价值也是40多万元。我这里要补写的是张超然先生于民国32年（1943年）在他家乡升坪兴办“超然分校”的情况。

秭归县复兴乡（现磨坪、升坪一带）地处西僻，交通阻塞，人民生活苦寒，文化落后。那时，富裕人家的子弟则以斗米四斤攻读于私塾，可进取无几。贫穷人家的儿女目不识丁者大有人在。鉴于如此情况，升坪张超然先生（因他排行为六，故里人呼之为六先生）遂毅然奋起，又一次将位于升坪河边的私人坝丘以及木材资金等捐献出来，在升坪河边建筑校舍，开办小学。

超然先生亲自设计施工。动员工匠、群众，戴月披星，仅三个月时间，便建成了一座土木

结构的比较宽敞的校舍。

校舍规模为明七暗十三间的楼房，礼堂居中。整栋校舍占地面积828平方米，（合田1.242亩，包括前后左右廊檐）。校舍前体育场内设有篮球架、沙坑、木马、单杠、双杠等。操场840平方米（合田1.26亩）。此外，还有伙房两间，占地面积112平方米（合田1.68分）。连同男、女厕所在内，总共学校面积达三亩以上。所用木材全部出自张超然私人山林，其数约60立方米。

张超然先生辛勤劳神，呈请秭归县教育科批准，聘请谭法传、张光凤、张乐天、张应堂、张周祯等为教师。招生广告张贴后，远近男女儿童纷纷赶来报名入学，学生竟达258名，共设四级八班。从此，琴声、读书声打破了升坪的千古沉默。秭归县县长杨干曾前往视察该校，十分赞扬张超然先生，为嘉奖其办学精神，遂命该校为“超然分校”（当时本部设在磨坪）。

民国34年，该校的首届高小毕业生多人考取秭归初中或简师。该校从开办至解放前夕，计高小毕业180人，初小毕业240人。解放后，

由人民政府接管，更名为升坪小学。

超然先生捐资兴学的事，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请听升坪人民的颂歌吧：克己办学，超然卓群，热心教育，惟六先生。

郑 家 龙

回忆彭季然先生致力办学的几个片断

我和彭季然先生第一次见面，是1932年暑假去宜昌投考中学。当时我们住在归兴巴旅宜同乡会里，会址设在宜昌环城西路集泰号内。他对桑梓的教育很关心，对来宜报考的学生，倍加勉励，寄予殷切希望。据回忆，那时彭先生在湖北省立第四中学任教务员，家住县府路（即现在的献福路）。后因省立四中校长易人，即去湖北省立第十一小学任教，家住小南湖边鹏程路。有时逢星期天，我们旅宜学生（如杜上先、姜朝雄等）到家拜谒，总是亲切地教导，诚恳地留吃家乡风味的便餐。先生有两男二女，那时均已入学，或初中，或小学或幼稚园，何夫人内助理家，井然有序，故他得专心致力于教学。一家尽是读书人，后来学成，个个都从事教育工作，虽生活清贫，但其乐融融，甚为乡里称羨！

抗日战争爆发，武汉受到空袭，湖北省府西迁恩施，允许省立中、小学迁移鄂西一带。

1938年武汉沦陷，宜昌受到日寇空袭的威胁，省立各中、小学，纷纷搬迁到峡江以内。在宜昌三斗坪高家冲，有省立宜昌县第一区小学，在秭归有省立小学计三所，即省一、省二、省三小。省一小的校长为彭先生，校址原设在秭归县城文庙里以及顶塘何家祠堂内，但因空袭频繁，学生无法就读，后迁于新滩北岸，设分部于香溪向王庙。省二小设于窑湾溪，校长朱有存，省三小设新滩南岸，校长郑福增。有此三所省小的人员及课桌凳和图书仪器等，为1941年兴办秭归县初级中学（校址水田坝）奠定了基础。

纵观世事之兴起衰落，固以形势为转移，但也少不了人为的推动促成。上述三所省小能设在秭归，形势迫使是一面，当时武汉沦陷，宜昌置于日寇频频轰炸之下，武汉迁来的小学教职员工，大多携老带幼，囊中无钱，到恩施道路艰险修远，虽有车路可通，又怎么轮到他们坐车呢？又哪里有车来搬运校教具及图书仪器呢？他们离开了学校，即无法维持一家老少最低的生活。在这前进不能，后退无路之际，

因秭归滨临长江，两岸市镇较多，既有一水之便，又有峡江之险，且将来抗战胜利，顺流东下，方便极多，或有朝辞屈里长江边，千里武汉一日还之快。这是当时的客观情势，但更主要的是人的联系、推动或促成。先生原为省立十一小的教员多年，又是秭归人，当年毕业于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在宜昌有众多的同学、同事，彼此互相介绍、推荐和联系，东奔西走，上请下访，故有三所省立小学迁到秭归。有此三校教学水平较高的师资力量，教学设备留在秭归，遂逐渐为秭归培育出一批成绩优异，又有理想的学生。要数功劳，应数彭先生的首功。

我和先生一起工作，得朝夕聆教，是从1940年4月开始，直至1946年才分开的。回忆当时情况是这样的：省一小设在新滩北岸，照理说，这是好事，地方应极端欢迎，可是地方势力总是与一小为难，甚至有几个青年到校滋事。接着宜昌沦陷，省府停发各省小的经费，将省小划归县办。县府决定二、三两校，仍留原址继续开办，改名为秭归县立窑湾溪小学、

秭归县立南岸小学。省一小搬迁到秭归水田坝渡水头，改名为秭归县立水田坝小学。仅仅办了一学期，又生变动。1942年春各乡竞相办中心学校，由乡长兼任校长，先生数十年未脱离学校，于此只好任正存乡乡长兼校长一学期。

回顾从1938年至1942年春，历时仅四年，学校（省一小）三易其名，四度搬迁，始而县城文庙、吒溪顶塘何家祠堂，继而迁香溪、新滩北岸；又由新滩北岸迁回秭归水田坝渡水头，再迁到水田坝上坝，其中筹迁、搬运、修建等等，无一不由彭先生操劳。曾记得1941年冬，先生因操劳过度，身患重病卧床，亦念念不忘学校工作，每当我临榻问疾，总是嘱我如何，如何！

秭归之有中学，而又先于宜昌、兴山、巴东者，是与彭先生极力主张开办中学，而大力支持，多方促成分不开的！当时的情况是，宜昌失守，且省立各级中学，早已搬迁到恩施各地。原来秭归的学生外出升学，顺长江下西陵，可到宜昌武汉读书，现在去恩施，不但山

路险阻，而且途中兵荒马乱。读初中的学生年龄较小，家长极不放心外出就学。可是望子成龙之心，人皆有之。彭先生顺乎情势，以县参事的身分，联合林参事智伯，倡议兴办秭归县初级中学，以林参事的影响及彭先生在教育界的声望，家长无不信任并起而赞助，便纷纷送学生去水田坝读书，当时如香溪、沙镇溪、洩滩、三间等各乡镇送来的学生，均按程度分别读小学和初中班，初中班分甲乙两班，在胡家凉亭子屋里上课，全部用原省一小课桌凳，教师多由一小的教师兼任，如陈子祥、彭恩铸、姚作民……，专职的只有黄英烈。校长是县长刘应魁兼任，黄英烈为教导主任代行校务。

为什么为筹建秭归初级中学出力最多的彭先生当时反而未主持校务呢？原因不外三个：一是彭先生为人刚正不阿，有些人认为难得相处；二是旧社会的学校纯认学历任职，认为中学校长必须是大学生；三是地域势力有峡里峡外之分。黄英烈得以到秭归初级中学主持校政，原因也有三个：一是性格唯唯诺诺，软软绵绵，正合当事者的口味；二是某某大学学英语

的，算是大学生；三是黄是峡外较有声望的张率五的东床，自然能得到县参事林智伯极力推荐，鼎力维持。面对这种情况，彭先生却泰然处之。真可谓不计名位，任劳不居功。

1942年春，全县大办乡中心小学，原改名为秭归县立水田坝小学的这所学校，又迁上坝，改名为正存乡中心学校。中学仍由黄英烈主持校务，王永萱任教导主任，张云先、陈子祥等为教员，期中因王涉嫌被捕，致兴办未及一年的初中，几临夭折。1942年暑假，由以办教育为任而厌于乡政的彭先生、朱有存、郑叙甫等，大家串联有关人员，其中因教育科的督学陈作雷极力赞助，说服县长杨干，调整中学人事，改组中学，调原省立三个小学的主力教员及其负责人到水田坝中学任职任教，县长杨干兼校长，朱有存任教务主任代行校务。黄英烈留任训育主任，黄未到职即去恩施另就他业，由郑福增为训育主任。彭先生为简师班主任，因病后身体尚未恢复健康，暂由陈作雷代理。

1945年秋，简师由初中分出，单独设校于秭归县城，校长由县长高云安兼任，彭先生任